



文化中国
天地日新

中国民生的开拓

传统经济的发展是古代各个阶层
用尽心思与智慧、血汗与生命突
破有限的天时地利不断开拓前进
的艰难历程。

编

石吉



黄山书社

中国民生的开拓

主编 | 刘石吉

本书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授权出版发行简体字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生的开拓 / 刘石吉主编. ——合肥：黄山书社，2011.12 （文化中国丛书）
ISBN 978-7-5461-2472-8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国经济史—研究 IV. 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5242号

中国民生的开拓

刘石吉 主编

出版人：左克诚

责任编辑：郑实 肖小困

责任印制：李磊 赵彬

装帧设计：范晔文

出版：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230071

策划：香港三联书店北京工作室

发行：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电话：010-65513628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010-61202350

开本：710×1050 1/16 印张：24.5 字数：318千字

版次：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61-2472-8 定价：4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林载爵

这一套“文化中国”丛书原来是以“中国文化新论”之名，于1982年10月在台湾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总共12册，将近4000页，约400万字。这套丛书讨论了10个主题，包括：文明的根源、思想、文学、科技、制度、经济、学术、社会、艺术、宗教礼俗。以118个题目全面性的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各个层面，组合成一幅比较完整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图像。撰写者一共96位，网罗了当时年龄约30到40岁的青年学者，反映了1970年代以来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的反省与思考，构成了中国文化再诠释的新篇章。这些学者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几乎都位居台湾学术界与文化界的重要位置，当年所发表的论点今天仍然具有新意，可以提供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视角。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在受到西方文化长期的冲击以及连带对传统文化进行无情的批判之后，好不容易终于体认到传统与现代是连续性的整体，不可分割断绝。因此，一部超越传统的论述，适合于当时处境与需要，又有系统的中国文化史论著，显得十分迫切。其次，中国文化在1970年代的华人世界需要重新被检视，而台湾则是一个恰当的

地方。台湾的学生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在大学又接受了西方式的学术训练，西方汉学家或台湾出身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历史学者，不断在台湾传播新的观念与思维，他们给台湾学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到1970年代，这样一批受到西方式现代教育熏陶，对传统中国文化又有新见解的年轻学者已经在台湾出现，成为台湾学术界的一股新兴力量，他们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自然有着不同的视野与不同的解释。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将他们集合起来，总体呈现一个全然有别于过去的中国文化的新观点与新解释。

于是，《联合报》的创办人王惕吾先生以他所设立的“文化基金会”资助了这个庞大的出版计划，目的就是要“提供一部丰富新颖、流畅可读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撰述者之所以以年轻一代的学者为主，最重要的原因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呈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三十年台湾文史教育的成果，并且深信年轻一代学者以其所吸收的西方知识、所接受的近代治学方法训练，必能对传统文化提出新的解释观点。

从历史背景来看，1975年是台湾思想发展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林毓生教授首度返台任教，开启了一批想要获得更精密的思想方式的青年学生的视野。他在这一年的5月发表了一篇长文：《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点燃了沉闷气氛下青年学生重探狂飙年代的兴趣，与领会思想问题的不同讨论方式。同年年底，余英时教授发表了《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文章中深入而前所未有的观点，让青年学生发现思想的新世界，这个世界辽阔无边，只要运用理智的思考与分析，加上一些想象力，便可展翅飞翔，一股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开始出现。

隔年，1976年，余英时在《联合报》副刊上陆续发表《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术发微》等文，为当时争论不休的“专制”问题提出了中肯而又有说服力的解释。9月，余英时将上述文章及其他论著结集为《历史与思想》，由联经出版，这是余英时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产生极

为广泛的影响。

不论林毓生或余英时，在讨论问题时都不时引用当代西方学者的观点，对台湾青年学生带来极大的刺激。此后，翻译现代思想名著成为几家出版社的共同职志，知识青年在这方面所表现的求智渴望，是1970年代末期台湾文化界极为突出的现象，这是一个思想燃烧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中，知识青年一方面向西方看，一方面又回望中国传统文化，企图让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受到批判之后赋予新的解释，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中国文化新论”就是这个组合的产物。

这套丛书的编撰过程也有其新颖之处。一般丛书的编撰，惯例上都是汇集单篇论文而成，这一次突破了旧有的方法，从开始就采取了以研究讨论为基础的共同参与方式。自丛书的主题、篇目，各篇间的相互关联，以至各篇文章的论旨，都经过每册作者讨论后才决定。初稿完成时，也经过切磋、问难，然后，再次修改定稿。所以，这套丛书并非过去旧有形式的论文集，而是具有主题、结构的集体创作。

有关文化史的研究，不论通史式的概述或断代式的专论，都不可避免的有其缺失。概述易省略其深奥与意涵，专论易疏忽其源流与发展。这套丛书则采取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完全根据问题的性质，或通贯而观，或断代而论。这种研究方式，保留了方法上的极大弹性，同时，也更容易彰显问题本身的性质，提出更周全的解释。以关于文学的两册为例，一册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间情爱的关注、幻想与神话，到智与美的融合，一共设计了六项我们认为能够充分表征中国文学传统的主题，给予系统性的解说，并讨论了文学的形式与意义、抒情精神与抒情传统。另一册则分别就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宋诗、咏怀、咏物、小说、戏剧等重要的文学类别加以论述。两者配合，相信不但突破了旧有的文学史形式，而且更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内容。有关学术的一册，问题的选定则侧重每个时期的不同成就，从学术的萌芽到经学、注疏、理学、考据学，一一论列，以见学术的发展。关于制度与艺术的卷册则又注重各个不同的部

分或类别。制度的一册里讨论了皇帝、宰相、监察、选举、考试、史官、地方行政、君主教育等官僚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并申述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与历代政治改革的理想。关于艺术一册的内容包括了美学思想、青铜、玉器、陶瓷、雕塑、书法、绘画、文人生活工艺品、建筑等重要部分。

这套丛书既然是以问题为主的研究，自然而然，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一则反映了年轻一代学者的主要关心所在，一则想透过新问题表达新的解释观点。以关于思想的两册为例，讨论了忠、孝、仁、礼、公、私、仕、隐、常、变等传统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并作了新的阐释；同时也提出了理想人格、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德治与法治、儒家政治理想、法理依据、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均富理想、管制与放任、道德自主与社会约束、道德与政治、自然秩序与人文秩序、自然观念等新问题，赋予传统思想新的意义。借着尝试提出新解释，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更能显现出来。

然而，新的解释观点并非凭空杜撰而来，在这一点上，这套丛书特别强调广泛利用前辈学者的杰出研究成果，以此为根基，再作进一步的发挥。因此，钱穆、萧公权、李济、徐复观、牟宗三、杨联陞、屈万里、全汉昇、刘若愚、陈世骧、李剑农、赵冈、劳榦、张光直、余英时等等许多前辈学者的优异著作，都随时被年轻一代的学者所征引。这种现象除了说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年轻一代学者的绝对肯定与尊敬外，更表示了处于变动之中的中国近代学术生命，在台湾的一脉相传，其意义自是无限深远。

尽管当时两岸隔绝，但各篇文章中，凡是论及根源，都运用了最新的地下考古材料来印证解说，根据最新的地下出土文物，分别从居址、器物、食粮、国家等方面，完整而清晰地描绘了八千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我们对先民活动起居的情形、食米（小米、稻米）吃肉（以猪为主的家畜饲养）的文明、上古社会形态的变迁、国家组织的出现，也就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特别是提出“满天星斗”

的上古文明的多元发展史观，更是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样性的了解。其他诸如讨论到地理环境、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人文思想、天下观念等问题的文章，也都能参证地下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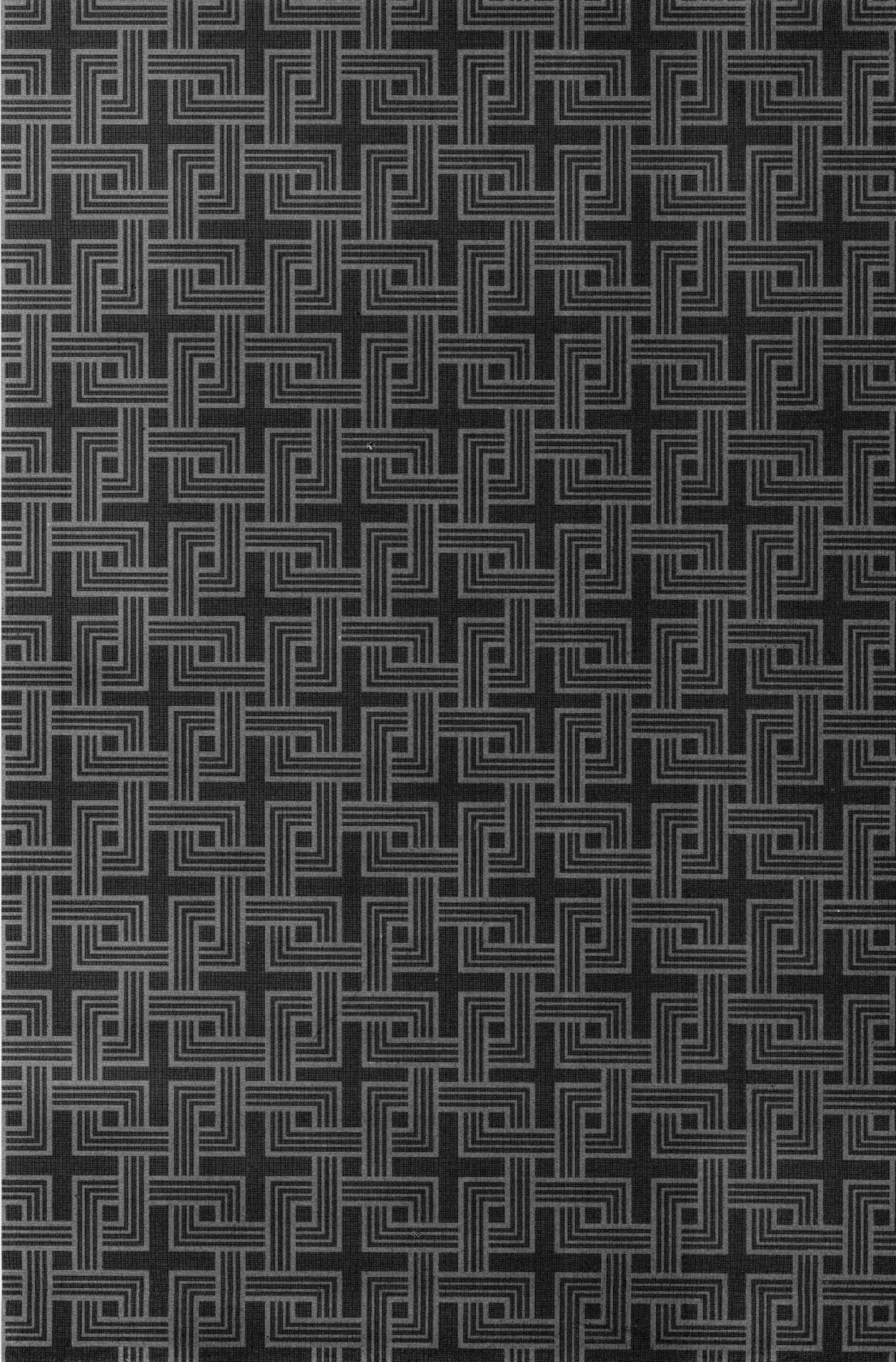
这套丛书自始即希望能涵盖较为广阔的文化活动层面。不可否认，近代历史教育过于偏重政治史，这使得历史教育的文化内涵，显得极其贫乏。这套丛书除了具备广为熟知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制度之外，更包含了以往较受忽视的社会、经济、科技、宗教、礼俗等层面。过去，对于中国科技史的了解，总是借助于英国李约瑟或日本薮内清的著作，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本与科技有关的专著，这也代表着年轻一代的科技史研究者踏出了一大步。在台湾，经济史是当时的一门新兴学问，年轻一代投入这项研究工作的，愈来愈多，相关经济的这本便是这些研究者所展现的成绩，分别从农业的自然环境、农业水利、新耕地的开发、土地分配、生产技术、商业、城市、货币信用、交通、海外贸易、财政税务等十一个方面，建构一部经济发展史。关于传统宗教，也选择了几个重要的问题来讨论。特别要一提的是风尚礼俗。近代以来，在对传统进行批判时，礼俗必定首当其冲，自命新派者，即清末所谓的“文明人”，弃之如敝履。然而，这套丛书中关于礼俗的则本着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探讨了祭祀之仪、婚丧之礼、长幼之伦、以及民间节庆、娱乐的文化意义，赋予这些传统礼俗一个新的文化生命，纳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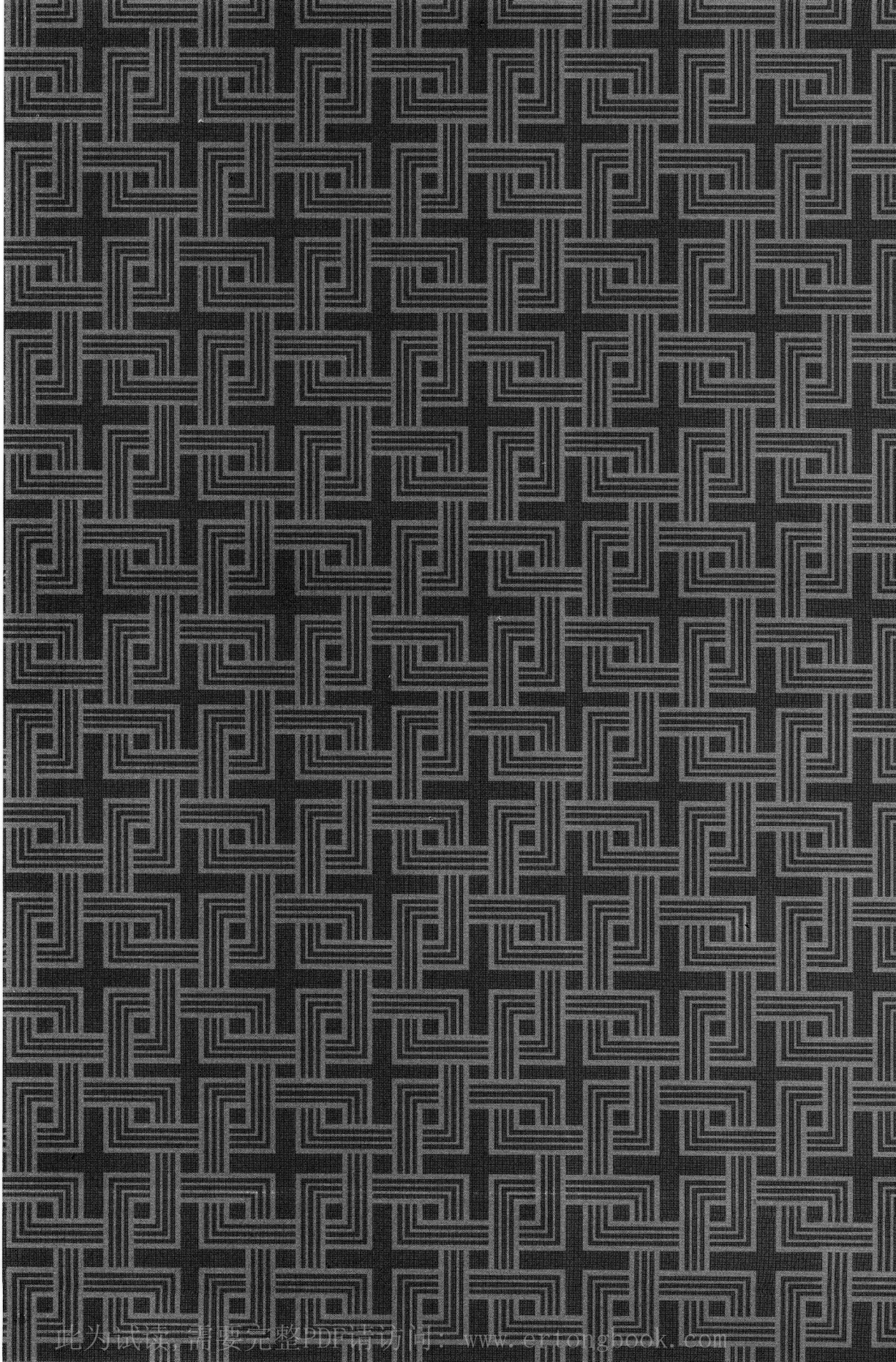
在简述这套丛书的编撰过程与内容特色后，作为当年的执行编辑，我非常高兴这套丛书在李安小姐的主持之下，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版，期待书中的观点能够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有所助益。

2011年11月

目 录

i	总 序
	林载爵
4	导 言
	刘石吉
12	择地顺时 —— 农业的自然环境
	陈良佐
40	沟洫之利 —— 古代农业水利的发展与成就
	黄耀能
66	披荆斩棘 —— 新耕地的开发
	梁庚尧
98	有土有财 —— 土地分配与经营
	戴晋新
126	多能巧思 —— 手工业的发展
	陈慈玉
160	懋迁化居 —— 商人与商业活动
	陈国栋
192	城郭市廛 —— 城市的机能、特征及其转型
	刘石吉
232	通货利商 —— 货币与信用
	陈国栋
268	舟车之利 —— 交通与运输
	张瑞德
302	梯山航海 —— 海外贸易的发展
	李东华
348	轻徭薄赋 —— 财政与税务
	庄吉发
378	作者简介





导 言

刘石吉

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过去均偏重于专题式的深入探讨，少数通史性的论著，也都受制于断代而论；两者均很难使我们对于传统经济有整体的认识。本书各个主题的编排便是为补救这项缺失而设计，分别从农业环境、水利兴建、耕地开发、土地分配、手工业、商人与商业、城市、货币、交通运输、海外贸易、财政税务等11个经济部门，加以贯通性的论述，期能组合成一部明白晓畅的中国经济发展史。

在中国农业的发展方面，陈良佐先生的《择地顺时——农业的自然环境》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和长江流域在相距不远的期间，先后都展开了农作物的栽培工作，成为两个不同的农业中心。前者以栽培旱地作物的粟为主，后者则以水稻为主。但此后的发展却是黄河流域领先长江流域，这种结果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原先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我国气候大体是温暖多雨，当古代气候由湿热转向干冷时，黄河流域也由北亚热带转变为温带，使得适宜湿热地区发生的疾病，如疟疾以及其他疾病，因之减少或完全绝迹，这对人口的成长必然相当有利。相反的，长江流域或以南地区仍属热带、亚热带，湿热的气候使得疟疾瘴疫流行。换言之，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健康，以及人口的成长，都优于长江流域。准此以论，长江流域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包括：人口的成长缓慢，缺乏健康的劳动力，湿泞、干硬的酸性土壤使整地困难，缺少广大平原，同时天然食物的丰富也造成江南人民不去努力改进农业生产技术。而黄河流域农业迅速发展的原因则为：较少的疾病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压力又促使生产方式改进，艰苦的自然环境塑造了勤劳、节俭、刻苦的习性，土质疏松、肥沃，气候的多变化产生了精确的历法来指导农业生产。以上这些因素使得黄河流域在战国时代，便已奠定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基础；反之，长江流域直到西汉初期仍未脱离原始农业的特征。

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既无天时与地利，它的农业发展自有待于水利的开发与利用，于是古代的农民，用尽心思与智慧，克服自然环境的限制，开发水利以灌溉经营农业。如此，不但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

展，凌驾于其他文明古国；农业水利事业发达的结果，也开创出以北方旱地农业经营为中心的秦汉统一大帝国，其后更发展出以南方水田农业开发为重点的隋唐大帝国。水利事业在中国农业经济开发上，显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黄耀能先生的《沟洫之利——古代农业水利的发展与成就》一文便从古代到隋唐帝国的诞生，逐代叙述农业水利事业的发展与成就，借以了解古代农业水利经营与古代帝国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

中国境内广大的农业区，并非自古以来即已存在，而是历史长期演变的结果，梁庚尧先生的《披荆斩棘——新耕地的开发》说明了这个扩展的过程。大体而言，中国农业疆域的扩展有自北而南的趋势。如前所述，自远古以至汉末，农业主要在北方发展，南方农业远比北方落后。汉末以后，由于长期战乱破坏，北方农业受到严重打击，开始衰落，农业地理的重心于是逐渐往南方转移。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唐代以后，南方农业才有飞跃的发展，并且超越北方，成为农业地理的重心。唐宋以后，人口持续成长，并且继续往南方集中，南方土地被充分利用，精耕农业在南方高度发展。到了明清时代，内地耕地已垦辟无遗，过剩的人口往外谋求生活的出路，除了移民南洋之外，便是四向迁往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西北的内蒙古和新疆，山海关外的东北，以及东南海上的台湾等地广人稀的地区，逐步地开发了边疆的土地。近代农业疆域扩展的方向，也就由北而南转而为向四方发展。在这一个扩展的过程中，农作物的种类愈来愈繁多，耕作的方法愈来愈精细，中华民族生活的范围愈来愈广大。不仅如此，中国人的生活传统在这个扩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国文化也伴随着这个扩展过程而扩展。

土地的开发必然造成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戴晋新先生的《有土有财——土地分配与经营》对此有详细的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战国以前是公有制时期，战国时代是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的转变期，战国以后，除了北魏太和年间至唐代中叶的二百七八十年之间曾有一

些地区实施过性质特殊的均田制外，大体上皆为私有制。土地私有制的最大特色，就是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在古代，土地又是个人社会地位和一切权力的基础，一个人有能力购买大量土地，就能拥有势力。土地既然如此可贵，自然成为人人争逐的目标，稍有财力者，无不竞相把资本投资在土地上，土地兼并的现象于是产生，这是土地私有制的根本问题。秦汉以后，历代都有学者留心这个问题，并提出各种对策，其措施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法律来限制私人拥有土地的最高面积，手段比较温和；另一类则倾向于以强制分配、禁止买卖的土地国有制来取代土地私有制，做法比较激烈。前者包括西晋的占田制和历代的限田措施，后者则包括新莽的王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

陈慈玉小姐的《多能巧思——手工业的发展》，以纺织业为中心，分从丝织、麻织、棉纺织三部分来观察中国手工业中表现最辉煌的一面。唐代以前，一般农家的织布作业是以自家消费和贡纳为前提，商品生产性质的织布业在农家尚未发达。唐末以降，商业资本导入农村，促进农村经济的分解，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逐渐崩坏，农村手工业的商品生产特征也就渐渐明显。明中叶以后，广大的佃农阶层因为收入低微，必须将剩余劳动力投入农耕以外足以补充家计的副业，农家的手工业便因此成为赋税与田租的来源，不再是单纯的自给生产。

农业、手工业之外，商业的发展也颇有可观。陈国栋先生的《懋迁化居——商人与商业活动》描述了它的进展。中国的商人起源极早，到了战国时代，商品流通广泛，商人甚至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很高的地位。汉初虽行抑商政策，但商人依旧保有他们的声势，而且继续发展，出现了一些大商业。魏晋南北朝时，原本周流天下的商贾，遭遇到战争的阻滞，暂时销声匿迹，商业也从而萧条。直到隋唐，政治秩序恢复后，商人再度抬头，陶瓷、茶、盐等大宗商品脱颖而出，而且南方经过大力开发后，奠定了后日宋代物阜民丰、百业繁盛的基础。社会上对商人的观念，在唐、宋之间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商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称为“行会”的同业组织也发达起来。这种商业发达的现

象一直持续绵延，历久不衰。从明朝嘉靖以来，至于清末，山西商人和安徽（新安）商人占据了我国陆上的商业舞台。

拙作《城郭市廛——城市的机能、特征及其转型》对于中国城市的性质作了简单的说明。就历代城市的数量与人口，以及城市的建筑规划来看，中国城市在人类史上占有特殊显著的地位。中国的都市基本上是“城墙都市”，面积远较欧洲与日本的城堡为大，特别是中古以降的许多主要都城，其规模建置，在人类史上常居首位。历代的京城人口，在工业革命以前，甚至直到19世纪50年代伦敦兴起以前，也常是当时全世界的最高记录。城市数量之夥，亦堪媲美西方。城市的内部规划在整个世界的城市发展史上更具有十分显著的成功地位。唐宋时代，中国的城市产生了“革命”，那就是商业性城市的兴起，一方面行政中心的经济机能强化，一方面非行政中心的市镇出现。到了明清时代，市镇的涵义完全以商业机能为标准，甚至有了专业市镇的诞生，市镇人口与数量都愈来愈多，造成了城市化的现象。传统中国城市的特质是城镇一致性，此与西方迥异。中国一直没有都市优越性的观念，也一直不轻视农村和乡土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事实上，传统中国文化的主要据点应是乡村，并没有明显的城市文化。只有唐宋以后商业城市兴起，城市在中国文化的经济生活中才占有较显著的地位。只有近代西化的通商口岸出现后，才改变传统城市的性质，中国城市才具备西方工业化后城市的特征。

商业的活动需以钱币为媒介，陈国栋先生的《通货利商——货币与信用》即在叙述货币的发展。先秦是货币的创始时代，先有贝币，后有金属货币。秦汉时代，铜钱成为社会上的主要货币。三国以迄隋唐属于“自然经济”，是实物货币的时代。唐以后铜钱又恢复了主要货币的地位，铜钱的广泛流通造成长期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宋时，由于交易量大增，纸币及其他信用工具应运而生。明、清之间，经由菲律宾流入了大量的美洲白银，是白银与铜钱并行的时代，但也造成了经济史上的“物价革命”，以白银表示的物价大幅度上扬。不过因为货

币供给的充足，刺激了生产与就业，而有嘉靖——万历与乾隆——嘉庆两段长时期的经济繁荣。

张瑞德先生的《舟车之利——交通与运输》分别从道路、馆舍与驿递制度、人工河道、车、船等几方面探讨传统的交通与运输。综合来看，历代交通建设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此表现于道路网和运河均以都城为中心向外发展。方式上，水运极为发达，但陆运不发达。没有水运可供利用的区域，发展的程度通常也都远较有水运的区域落后，但是中国的水运在传统末期已发展至最高点，运费无法再降低。技术上，不论是交通工程或交通工具，都有许多省力的发明。胸式马具、鞍套式马具、独轮车、马镫、船尾舵、纵帆、船闸、运河等都是领先西方的发明。运输上，速度缓慢且运费高昂限制了长程贸易的发展，这是历代交通在促进经济发展上的局限。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唐宋元时代曾发展至足以称为“海权国”的地步，李东华先生的《梯山航海——海外贸易的发展》对此有详细的解说。秦汉时代是中国海外贸易的萌芽期，交通路线一由山东、河北沿海东行往韩、日，一由广东、交趾沿海南行往东南亚。六朝时期为进展期。由于印度佛教的大量东传及南朝诸国努力向外发展，使得海外交通、贸易有相当重大的进展。隋初至元末为兴盛期。唐中期以后由于世界性海上贸易圈的形成，东西交通、贸易大为发展，宋元时代的海外贸易更达于鼎盛，其时万邦来会，商旅络绎于途，海外贸易收入增加，贸易地区扩大，广州、扬州等贸易口岸空前繁荣，国家财政依赖海外贸易的程度日甚一日。不幸，明初至清中叶鸦片战争期间却进入闭关时期，对外贸易受到压抑，而对外开放心态的消失，影响尤为深远。

国家赋税，关系国计民生，庄吉发先生的《轻徭薄赋——财政与税务》指出：中国历代赋役政策，大体根据儒家的理论，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对赋税的负担，力求公平合理。就其发展来看，上古税收甚为宽大，汉代税额颇轻，三国两晋时代，农民荫附豪门，租额